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资治通鉴/顾问 赵宗鼎 主编 苏双碧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
干部读本
ISBN 7-216-01875-3

I. 资...

I. ①赵... ②苏...

II. ①古代史-中国-编年体-干部教育-普及读物

②《资治通鉴》-干部教育-普及读物

IV. K204.3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7 印张 6 插页 673 千字

1996 年 5 月第 1 版 199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 140

定价:29.50 元

学史明理
经世致用

题资治通鉴粹要读本

一九九六年六月 赵宗霖



略谈干部要学点历史

苏双碧

湖北人民出版社决定出版《资治通鉴》干部读本,这是一件值得称赞的好事。干部学点历史,对提高干部的政治素质和思想文化素质具有重要作用。而《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较之记述有关朝代的各断代史简练得多。即便如此,也多达294卷,对于一般党政干部来说,系统读起来仍然很难。而出版干部读本,将其中可以作借鉴的,或于干部修养有关的段落摘出来,分类编排,并对其难懂的字句作必要的注解,对较重要的条文加评语,这样,文化程度低些的干部也可以读懂。这无疑干部学习历史的方便之举。至于干部为什么必须掌握历史知识,历史知识于工作有什么借鉴作用,它能不能古为今用,这些是干部学历史经常遇到的问题,也是经常要思考的问题。下面我想就这些问题多谈几句,作为一种意见,供干部学习历史时参考。

一、干部要学点历史

广大党政干部要学点历史，要有一定的历史知识，这一点，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都是一再强调过的。这是因为：其一，现实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继续。中国为什么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能取得胜利，中国为什么要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为什么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等等，这都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其二，掌握历史知识是衡量干部素质的重要依据之一。特别是领导干部缺乏历史知识，就很难制定出符合国情的方针政策来。在这方面，经典作家是个典范，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还是毛泽东，他们都非常熟悉历史，并能依据当时的形势和历史的启迪，制定出无产阶级的斗争策略和任务，或者依据当时历史发展趋势，对当前形势作出准确判断。恩格斯称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一部天才的著作”。他指出雾月十八日事变“像晴天霹雳一样震惊了整个政治界”。而马克思由于“研究了法国过去的历史，而且还考察了法国时事的一切细节”，所以“事变从来也没有使他感到意外”，因而能以“法国历史的全部进程的内在联系”，来揭示事变的“这种联系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恩格斯：《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德文第3版序言》）。可见，马克思的“天才”判断是源于对法国历史的了解。但这种了解和判断对领导者来说，却是有普遍意义的。例如，有位英国历史学家写了一本《历史的功用》，就认为，文官“如果想跻入高官之列，历史是必经之途”，因为“文官应付的行政问题，历史能提供正确的背景”。他风趣地举了这么一个例子，韩德生爵士是1937—1939年英国驻德国大使，由于他不懂德国历史，对德国侵略的历史一无所知，所以，对希特勒发动侵略战争，没有半点预感。作者嘲笑这种不懂历史的外交官是“三流头脑而居一等高位”。当

然,我们并不赞成把历史知识作为跻身高官的敲门砖,但“高官”尤其必须掌握历史知识,却是必备之方。其三,历史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毛泽东曾经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4页)历史知识能够帮助提高能力和水平,毛泽东在几十年政治生涯中的体会是很深的。所以,他很重视研究历史和学习历史。正如周恩来在《学习毛泽东》一文中所说的:“毛主席开始很喜欢读古书,现在做文章、讲话常常运用历史经验教训,运用得最熟练。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33页)。他不但对中国历史十分熟悉,对外国历史也很熟悉。前法国驻华大使马纳克在和毛泽东交谈之后说:“毛泽东对法国十八世纪以来的历史,对于法国革命,对于十九世纪相继进行的革命,对于巴黎公社,都有深刻的理解,他认为法国革命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性运动的起点”(见张贻玖:《毛泽东读史》第10页)。无疑,毛泽东之所以成为知识渊博,政治和文采都独领风骚的伟人,是和他有深厚的历史知识分不开的。我们还可以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邓小平的思想制定了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方针,也是根据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经济、文化十分落后这个现实,根据新中国建立以来近30年革命和建设的现实,以及国际风云变幻的事实提出来的。正因为小平同志对近代中国以来的历史有透彻的了解,才能提出这样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划时代方针来。其实,历史对于政治家的作用,早就为中外古今有识之士所认同。希腊著名的史学家波里比阿在其所著的《历史》中就说过:“就政治生活而言,最好的教育和训练就是要研习历史。取鉴于前人的覆辙,是教人如何英勇豪迈地面对困难、战胜命运的不二法门,除此以外别无他途。”(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第55页)。历史知识确实是提高人的聪明才智的重要教材,是训练干部提高政策水平、提高思维能力的重要教材。我赞成这样的说法,“史

学家不是预言家，他没有水晶球。但他能借过去的发展而将现代事件的过程作一合理、可靠的评价，也因此而窥知未来。”历史是有用的，干部没有一点历史知识，很难是个合格的干部。

二、关于《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是一部优秀的历史著作，正如毛泽东指出的，“《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见《毛泽东读史》第29页）。这里毛泽东指出司马光的立场、观点问题，其实，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出现之前，所有的历史著作作者的共性，提出来，目的是提醒干部要有分析地读，并无苛责司马光之意。毛泽东是着意肯定这部书“写得好”的，他对这部书所作的评价是公允的。他之所以赞扬这部书是因为可以从中“熟悉历史事件”，“汲取经验教训”。另外，司马光立志编这部书的用意也是便于官吏习史的。因为史籍浩繁，“诸生历年不能尽其篇章，毕世不暇其大略。”他才想“删取其要，为编年一书。”显然，他的初衷也是为诸生及各级官员学习历史提供方便的。后来司马光用了毕生精力，编成《资治通鉴》，如愿写成编年体通史，全书294卷，以及《目录》、《考异》各30卷，共354卷，记述了上起三家分晋下至五代之末，即公元前403年到公元959年，共1362年的历史。在这之前，中国可称通史者，唯《史记》，但它属纪传体，内容并不连贯。班固写《汉书》，开了朝代史风气。其后虽然有杜佑的《通典》，但内容太窄。司马光根据浩繁旧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写成这部编年体的《资治通鉴》，实是当时史界的创举，达到了为后人学史提供方便条件的目的。当然，光是简练还不够，更主要的它是一本编撰得很好很严肃的史书，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史学经典之一。可以这么说，唯《资治通鉴》的地位和影响可和司马迁的《史记》媲美。这是因为：

首先,由于这部著作的编撰十分严肃,又有明确分工。主编司马光、协修刘恕、刘攽和范祖禹、文学检阅司马康,都是很有学问的学者,加以主编司马光亲自拟写提纲、拟目,并逐条逐篇亲自审阅、校订。《通鉴》文字流畅,可读性强。其次,作者涉猎很广,所引史料甚丰,宋人高似孙说:“《通鉴》采正史之外,其中杂史诸书凡二百二十家。”清人胡元常录《通鉴考异》所载书名,“凡得二百七十二种”。近人张煦侯考索《通鉴》及《通鉴考异》,所引书共得三百零一种。过去官修史书参考只重正史,不录小说。司马光认为“实录、正史未必皆有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并对所引材料加以辨证,成为一部史实可靠,立论比较客观的巨著。司马光编写这部书共花了19年的时间。这19年,他“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十七),把全部精力都投到这部书的编著中去。所以《资治通鉴》成为历代帝王及各级官吏必读的史著之一。其三,司马光之所以要编撰《通鉴》,其中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作为“资治”,即主要是给皇帝及大臣治国经世作借鉴的。在编这部书之前,司马光曾向皇帝上书,阐明编此书意在“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以后编写基本上遵循了这个初衷。书成之后,神宗皇帝在钦定此书名称时,曾有御制序言一篇。其中说此书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教,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议,良谓备焉”。神宗皇帝对此书的评语是中肯的,也是客观的。他认为此书对君臣都颇有借鉴作用,即命名为《资治通鉴》。胡三省在《新注资治通鉴序》中指出,司马光编撰此书是给“神宗皇帝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又说:“温公之意,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以为书。”毛泽东称赞此书“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也有指这些可以为当今干部作借鉴之意。书中有关治道文字

很多。例如司马光认为，“致治之道有三：曰任官；曰信赏；曰必罚”。《通鉴》中有关这三条的内容都有过详细的记述。可见，《资治通鉴》著作的目的，是为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服务的。历史对于统治者来说，有其特别重要意义。为人君而不懂历史，“则欲治而不能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历史，“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如果我们剔去《资治通鉴》特定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内涵，那么，比较准确的历史记述，以及对官员的为政之道起风范作用的论述，对今天的各级干部还是可以起借鉴作用的。

三、关于古为今用

研究历史或者掌握历史知识能不能“古为今用”呢？这在学术界意见曾经有过分歧。但考察历代，历史和现实都是有密切关系的，历代史著也大多是“古为今用”的。这是因为，任何一部历史著作都离不开政治，或者说都是对历史上政治斗争和其他历史事件用史学家的立场、观点加以综合分析的结果。而史家的理想抱负则主要在于现实，即为现实的需要服务。司马迁在讲到孔子整理《春秋》时，介绍孔子的两句话：“后世知丘者以《春秋》，罪丘者亦以《春秋》。”这是因为孔子整理加工这部鲁国的史书时，采取了所谓“春秋笔法”，即对历史事实的评价，是根据他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作出的，目的是要阻止“周道衰败”。在他编撰的《春秋》中，不厌其烦地记录了臣弑君之例三十六，亡国七十二，诸侯奔走不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孔子想阻止奴隶制的崩溃，企图用鲁国 242 年的历史，作为君臣民的仪表。司马迁写《史记》时对孔子的思想动机作了深刻的剖析，他指出：当时“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其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 242 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

序》)在这里,司马迁明确指出,孔子是为阻止周道衰废,才修《春秋》,以作天下仪表,其目的是要达到周道复兴。显然,中国第一个史学家孔子编撰《春秋》就是古为今用的。司马迁写《史记》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即总结历史上统治阶级的兴衰得失来循正当今的历史趋向。《史记》开宗明义第一篇就是《黄帝本纪》,主张中国自黄帝以来,包括传说中的尧、舜到司马迁所处时代的汉王朝,都是黄帝的子孙,反映了司马迁明显的大一统思想。正是从这点出发,司马迁支持了曾经对他处以宫刑的汉武帝采取削弱诸侯王的措施,而且对汉初大封同姓王十分不满,认为他们的权力超过古代的诸侯王。他主张“强本干,弱枝叶”,他认为削弱中央集权的诸侯王是叛逆。而对汉武帝推行的有利于大一统的措施,如“推恩令”等等,他是赞成的。唐代的柳宗元写了一篇著名的《封建论》,同样是从维护封建国家统一的立场出发,反对当时出现的藩镇割据的局面,肯定了秦始皇用郡县制代替分封制的历史作用。指出汉初“有叛国而无叛郡”,唐代“有叛将而无叛州”,说明郡县制的设立是正确的,不能取消。

西方史学家也非常重视历史研究的古为今用,即为现实服务。号称西方史学鼻祖的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写了西方第一部史学著作《波希战史》,虽然它以“文字清雅娱人”著称,书中却有“以史训世”之意。稍后的希腊史学家波里比亚,在他所著《罗马史》中,就强调“只知道过去发生的事件是不够的,必须明白那些事件发生的原因”,而且特别应“注意历史的实用价值”。这里面的“以史训世”,“实用价值”,无疑都是为现实服务的。这说明西方最早的历史著作是注意古为今用的。

从12世纪到19世纪,西方历史学家研究历史,目的性和倾向性都是非常明确的,如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史学家们对封建神学的史学观点进行猛烈的攻击,就是为推翻封建统治,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服务。这个时期里,西方一些资产阶级学者研究中国文化和历

史,写了一批著作,如西班牙人门多萨编写《中华帝国史》,葡萄牙人鲁德昭编写《中华帝国志》,奥地利人卫匡编写《中国史初稿》,以及后来法国传教士冯秉正根据《通鉴纲目》和《续通鉴纲目》编译成《中国历史》十二卷,他们都不仅是出于对中国历史的特殊爱好,而是兼有由于资本主义的兴起,需要寻找原料和市场,殖民者要向东方和中国扩张,需要了解中国的历史。当时史学家们研究中国史大多也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家有一个叫“综合史学派”的,就公开宣称他们研究中国历史是为本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政策服务的。这些情况说明,不论上古、中古或近代,欧美历史学家研究本国或外国的历史,几乎都是为了当时现实的需要。

古今中外的事实都说明历史研究是不能离开现实的,如果它完全离开现实,就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就中国史学而言,为现实服务也很明显。仅举爱国主义的宣传和研究一例,几乎历代的史学家,都是极力推崇屈原、岳飞、郑成功、林则徐等等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在近代中国,当外国侵略者发动鸦片战争之后,一些政治家、历史学家就都在研究海防、筹边。“西学东渐”之始,由于人们急需了解西方,《海国图志》、《瀛环志略》一批介绍西方的著作便悄然问世,著名的“师夷之技以制夷”的口号也被提了出来。这种自发的研究,很快形成气候,自然是和对中华民族的热爱和担忧分不开的。中国爱国主义的历史遗产十分丰富,系统地研究和宣传,对今天在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有着重要的意义。正因为历史之于现实有重要的联系,它才有巨大的生命力。当然,我们这样说,是就普遍意义而言。这并不排斥一些带有基础性质的史学编纂和史料整理工作。从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长远任务来看,如考据学、训古学、古文献整理等等,这些从直觉上看和现实关系并不大,但它是历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对整个社会主义文化来说,这一部分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

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为借鉴现实和启发现实,这是古今中外

许多史学家、政治家研究历史的共同目的。封建社会的史学家、政治家主张“以史为鉴”，资产阶级史学家要“求真理而献诸世”，现在我们所说的研究历史要古为今用，都是要从历史上汲取经验教训，使当前或后世取法或引为鉴戒。但无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古为今用，目的、效果都是不同的。地主阶级研究历史古为今用，是为了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资产阶级研究历史古为今用，是为了证明资本主义社会“永恒不变”。历史的发展却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在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中，少数人压迫剥削大多数人，阶级对抗是这些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是统治者所无法解决的矛盾。因此，尽管他们研究历史也要古为今用，历史却很难真正按照他们的意志循行，当然也就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最多只能在某个问题上，在一个时期中，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奏效于一时，最终仍不能避免前车的覆辙。无产阶级的古为今用，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来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明确指出，社会力量和自然力量一样，“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 and 影响，那末，要使它们愈来愈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9页）。马克思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重大贡献，就在于使历史成为科学，在于可以认识历史、理解历史，并能够捕捉历史的动向。这样就可以使我们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把历史这一极其复杂、充满矛盾的现象看成是有规律的统一的过程。历史研究的全部问题就在于发现这种规律。所以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研究历史，探索历史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个规律所揭示的现实，去规定本阶级自身的历史使命，对推动历史发展的进程，无疑会产生巨大的作用。因为历史的发展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遵循这个规律去研究历史，去古为今用，就必然是科学的，也必然会收到效果的。

不过，这里我们还必须着重指出，我们所说的古为今用，是有

条件的,是科学的,而不是牵强附会和庸俗的类比,更不能像“四人帮”那样搞影射史学。影射本身就是牵强附会,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是不科学的。即使在革命战争年代,一些严肃的进步的史学家出于义愤,在历史著作中以某一历史人物或某一历史事件影射敌对势力的某一特定人物或某一特定事件,但过后他们都作了郑重声明,认为那些是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对于以科学态度研究历史的人来说是不可取的。

四、关于历史借鉴

历史借鉴其实是“古为今用”内在的另一种含义,但角度和针对性不大相同,故单独提出来说一说。借鉴一般是有特定目标和特定含义的。人类社会,有各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但人类社会活动的基本要求是共同的。阶级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遗留的东西在今天并没有完全消失,当时统治者为解决那些社会问题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对我们仍然有可借鉴之处。尽管社会性质已经大不相同,但是,历史上的许多做法及其效果,即成功和失败,有许多地方是可以借鉴的。所谓“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前车”是指历史的某一事件,而“后车”则是指现实中的某一事件。正因为历史上发生的种种事件,有成功也有失败,因而借鉴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不过,借鉴不论正面借鉴或反面借鉴都是有条件的,而不是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什么问题都随便找一两个历史实例来借鉴。列宁在论述历史比较时曾经指出,借鉴“这只是指在一定的条件下,在许可作一般的历史类比的限度内”(《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189页)。离开了这个条件和限度就不能起真正的借鉴作用。

那么,历史借鉴的条件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对某些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研究,确实可以为我们现实工作提供经验教训。当然,这些历史事件中的人和事都应是真实的,而不是虚构的。正

面的借鉴,也只是吸取它的精神,而不是原样效法;而反面的借鉴,则主要是把错误及其失败的教训引以为鉴戒。例如,在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现象,凡是生产力遭到破坏,社会就容易发生动乱,而动乱又必然导致生产力更大的破坏。所以,历史上有作为的皇帝大臣,以至各级官员,都要采取措施,缓和社会矛盾,推进生产力发展。而一些昏君、墨吏,则以他们的暴虐行为,加剧社会矛盾,并导致王朝的覆灭。这种带有普遍性的历史现象,是可以为历代当权者作借鉴的。当然,历史现象可能重复出现,但它的性质却完全不同。不同性质的社会,有着不同性质的矛盾,解决矛盾的办法,也不尽相同。但至少,社会动乱会导致生产力破坏,生产力停滞不前,会导致社会动乱。这种普遍的历史现象,却实际上成了历史的规律。从这个规律看,发展生产力是第一位的,是硬道理,只有立足于推动生产力发展这一根本,社会才能真正的稳定,才能推动历史向前发展。当然,从总的方面看,历史借鉴要极其谨慎,分析要有科学根据,结论要实事求是。毛泽东是善于用历史作借鉴的,例如,1962年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民主集中制时说:从前有个项羽,“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而刘邦则“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接着他批评当时有些领导干部“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1页)。这种借鉴是直接的,针对性是很强的。还有一个例子,就是1944年正当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的时刻,毛泽东把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印发给全党学习。他在《学习和时局》一文中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947、948页)李自成是明末著名农民军领袖,进入北京城后,

其部将骄傲，将士不受约束，贪污腐败，很快遭到失败。这个历史教训，不仅对于领导民族战争行将取得胜利的共产党来说是很好的借鉴，而且对处于执政党地位的共产党来说不也是很好的借鉴吗！

今天，我们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征途中，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中，当然也要以史为鉴。把历史当成一面镜子。例如，针对干部中存在的一些腐败行为，可以联系历史提倡和宣传历史上一些著名的清官、廉吏，宣传他们为官清廉、严于执法、敢说真话的精神；这方面，《资治通鉴》中对循吏的赞扬，对贪官和昏君的揭露也是不少的。又如，在强调干部要善于听取不同意见时，可以总结一下唐太宗“兼听”和“纳谏”使唐初政权巩固、社会安定的历史；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可以着重研究一下历代有作为的政治家采取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措施，以及几度出现的历史盛世的原因等等。这种借鉴，对现实工作和人们的思想都是有帮助的，是一种积极因素。

《资治通鉴》干部读本是一部干部学习历史，掌握历史知识的有益之书。我们几位同仁受湖北人民出版社的委托，编注成此书，奉献给正在着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党政干部们，奉献给正在为改革开放，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出谋划策的科技干部和企业家们，以及奉献给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的官兵们。希望我们的这点心意，能在提高干部素质上起到一些作用，收到一点效果。

总 目

一	治国安邦	为政之道	[1]
二	选贤任能	用人无私	[216]
三	勤政廉政	忠于职守	[291]
四	爱国至上	顾全大局	[337]
五	执法如山	刚正不阿	[373]
六	直言敢谏	疾恶如仇	[429]
七	豁达大度	从谏如流	[484]
八	政绩卓著	造福一方	[515]
九	重教勤学	提倡节俭	[538]
十	严于律己	修身自好	[579]
十一	揭露腐败	吸取教训	[637]
十二	前车之鉴	是非得失	[746]

目 录

一、治国安邦 为政之道

- | | |
|-------------------|--------------------|
| 魏文侯以贤兴国····· (1) | 无以家为 ····· (20) |
| 秦孝公用卫鞅变法····· (4) | 桑弘羊调控物价 ····· (21) |
| 李牧守边破匈奴····· (7) | 霍光掌权国力逐 |
| 刘邦入秦约法三章····· (8) | 渐恢复 ····· (22) |
| 陆贾说治国当文武 | 霍光废无德嗣君昌 |
| 并用····· (9) | 邑王 ····· (22) |
| 曹参为相遵行萧何 | 汉宣帝厉精图治 ····· (28) |
| 法规 ····· (10) | 萧望之说朝无争臣 |
| 贾谊言居安思危、重 | 则不知过 ····· (29) |
| 农积贮 ····· (11) | 耿寿昌调控谷价设 |
| 晁错主张劝农贵粟 ··· (13) | 常平仓 ····· (29) |
| 李广智勇退敌 ····· (16) | 汉宣帝言以霸王道 |
| 汉兴以俭治国由贫 | 杂之治天下 ····· (30) |
| 到富 ····· (17) | 扬雄说不应拒绝匈 |
| 汲黯为政责大不苛 | 奴入朝 ····· (31) |
| 小 ····· (18) | 朱浮说不宜频繁更 |
| 霍去病说匈奴未灭 | 换地方长官 ····· (34) |

马援自信外敌不敢	心为上 (65)
犯界 (35)	顾雍为吴丞相治国
班超智勇通西域 (36)	有方 (65)
袁安举奏大批赃官 ... (38)	诸葛亮七擒孟获安
虞诡反对弃凉州 (39)	定南方 (67)
李固说宦官权重是	诸葛亮的出师表 (68)
国家心腹之患 (41)	徐邈治凉州办法多 ... (70)
张纲反贪先从权奸	张纡谈治国之道在
开刀 (44)	于能否用贤 (71)
皇甫规说君舟民水	杨阜说滥用民力必
权臣操桨 (47)	亡 (72)
崔寔谈治国之道 (48)	王基以舟水之喻谏
刘陶认为解决民饥	君节省民力 (73)
重于改铸钱币 (51)	邓艾倡议在两淮屯
贾琮安定交趾人心 ... (52)	田开渠 (75)
曹操招纳人才实行	董允为尚书令黄皓
屯田 (53)	不敢为非 (76)
荀彧、郭嘉分析袁绍	诸葛亮不妄赦蜀人
有十败曹操有十	称贤 (77)
胜 (55)	为政之道须奖罚分
荀悦谈为政之术 (57)	明 (77)
仲长统论治乱之道 ... (58)	傅玄论吏治 (78)
刘备三请诸葛亮和	改革内政须“省官”
隆中对策 (60)	“省事” (79)
刘备善用人而蜀中	裴頠论“清谈”误国 ... (80)
安定 (62)	赏罚应分明 法令
刘备临终托孤 (64)	须统一 (83)
马谡说用兵之道攻	清谈不能治国 (85)